周恩来和冯玉祥的密切交往

冯玉祥,字焕章,原籍安徽省巢县(今巢湖市),是著名的爱国将领。卢沟桥事变发生后,冯玉祥在南京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。周恩来对冯玉祥主张全民抗战的立场十分赞赏,冯玉祥对周恩来则极为佩服,对身边的人感叹道:"共产党真是有人才啊!"从这以后,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。

"我身边有几个共产党员?

1937年冬,上海和南京先后沦陷,冯玉祥撤到武汉,住在千家街福音堂里。此时他被撤销了国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,只保留了一些虚衔。当时周恩来住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,与冯玉祥是近邻,两人的接触愈发紧密。

1938年春,在周恩来指示下,邓颖超和李涛、凯丰等人多次到福音堂为冯玉祥的随从和手枪营官兵上课。冯玉祥身边工作人员的思想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,先后去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学习的就有30余人。

国府迁都重庆后,冯玉祥常派部下接周恩来到自己位于上清寺康庄的住所会晤。周恩来为他分析革命形势,鼓励他坚持进步。有时赶上饭点,冯玉祥便留周恩来吃饭,边吃边聊。遇到有重大事情,周恩来会及时与冯玉祥商量。在长期真诚的交往中,冯玉祥更加敬佩和信赖周恩来。

在重庆,社会上风传冯玉祥身边有共产党员,会对他有影响云云。冯玉祥直截了当地问周恩来:"我身边有几个共产党员?"这个问题不好答,如实相告就会暴露党的机密,拒绝回答又可能伤害冯玉祥的自尊心。周恩来稍微想了一下,巧妙地回答:"像这样具体的事情,我得回去查一查,才能搞清楚。"

几天后,周恩来派人送来一张纸条,上面列了3个人的名字,并且表示:"如不方便,也可以调走。"冯玉祥当即表示:"不必了,心中有数,今后办事就更方便了。"

营救胡志明

彼时尽管国共合作抗战,但国民党仍残酷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,甚至连在广西工作的越南革命运动领导人胡志明也遭到逮捕。周恩来请冯玉祥设法营救胡志明,冯玉祥一口应允。

冯玉祥专门去找蒋介石质问:"第一,胡是否是共产党姑且不论,即使是,也是越南共产党,我们有必要和有权逮捕外国共产党人吗?第二,越南是支持我们抗战的,胡志明应该是朋友,怎么成了罪人?第三,假使把赞同我们抗战的外国友人称罪人,那么,我们的抗战就是假的了,就会失掉国际间的一切同情……"

蒋介石被问得哑口无言,只得说马上叫人调查。不久,胡志明就获释了。

应周恩来的要求,冯玉祥先后营救了不少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出狱,如:张申府、楼适夷、沈钧儒等。

"知我者周先生也"

为进步和知名人士祝寿,是中共统战工作的一种好方式。1941年11月冯玉祥六十大寿(虚岁),重庆《新华日报》特辟出专版祝贺,刊登了各方面的祝电、贺词和寿文。当时,毛泽东、朱德、董必武、叶剑英等都从延安发来贺电,周恩来也撰写了《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》的专文,以示庆贺。

周恩来的贺词中,对冯玉祥的经历、志向抱负性格写得十分透彻,冯玉祥不止一次感动地说:"生我者父母,知我者周先生也。"并感慨道:"自从接触了共产党人,认识了周恩来先生之后,我心里才开始亮堂起来。我算是认准了,中国的希望,就在周先生他们身上啊!"

重庆上清寺"特园"是民盟元老鲜特生的公馆,冯玉祥的住所康庄也属特园的一部分。周恩来经常到这里活动,引导团结各党派和抗日爱国的民主人士,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劣行。特园经常是高朋满座,谈笑风生,后来大家便把特园称为"民主之家",冯玉祥还专门为特园题写了"民主之家"的门匾。

抗战胜利后,冯玉祥因不满国民政府的内战独裁政策,遭到蒋介石的嫉恨和排斥,被迫赴美"考察水利"。冯玉祥出国前住在上海,1946年8月,周恩来和邓颖超不避危险,亲自登门看望冯玉祥夫妇。

1948年7月,冯玉祥响应中共"五一"号召,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阻挠,终于在纽约登上了苏联轮船"胜利号"回国。不幸的是该客轮在黑海失火,冯玉祥遇难。在周恩来的关心下,冯玉祥的骨灰最终被安葬在山东泰山。

(摘自《党史纵览》)

蒋介石留遗嘱的"癖好"

1975年4月5日夜,蒋介石病逝于台北,终年88岁。

蒋介石有留遗嘱的"特殊癖好",他认为生前就要把事情交代好,从1920年就开始写遗嘱了。当时在打仗,遗嘱是关于财产怎么分不过 ,他当时也没什么财产。

1934年,他跟宋美龄第一次回到奉化,碰到要处理蒋经国、蒋纬国和宋美龄的关系问题,他写了一份遗嘱,除了交代他死后宋美龄要与经国、纬国以母子相待外,还说财产如何分,甚至说到死后要与宋美龄合葬在南京中山陵。

"西安事变"时他写了3份遗嘱,蒋经国、蒋纬国各1份,宋美龄1份,交代家里的关系。他对宋美龄说如果你对我好,就把经国、纬国当成自己的儿子。又对经国、纬国讲,如果认我做父亲,就要把宋美龄当作母亲。之后,又像孙中山一样写了一封《告国民书》。

到了台湾,1962年蒋介石因为前列腺要动手术,写了一份遗嘱交代"交班计划"。当时陈诚是"副总统",如果蒋去世的话由陈继任"总统";剩下台湾两个最重要的职位,台湾省主席和"行政院院长",他要求只能在周至柔、袁守谦和蒋经国中三选二。周、袁是台湾省主席、"交通部部长",地位较高,蒋经国当时资历最浅,职位最低,而蒋将其与陈诚并列,嘱咐"互谅互助,彻底合作",是竭力提升蒋经国的地位。

1971年蒋介石写了一份遗嘱,说如果他不在了,蒋经国可以做严家淦的助手,担任"行政院长",且党政必须采取集体领导制。当时制度上规定严家淦权力最大,集体领导制实际上是不信任严,也是在提醒他不能把权力全部继承,实际上是让蒋经国通过集体领导制获得权力。

1972年蒋经国当了"行政院长","接班人"的地位基本稳固了,所以这以后的遗嘱就完全不涉及人事的事情。

蒋介石最后的遗嘱是在1975年3月29日口授,由秘书秦孝仪整理记录的。

对于当时台湾民众来说,蒋介石去世的消息还是很震撼的。各种假期活动取消,电影院等娱乐场所停止营业,各商店门前下半旗哀悼,民众多佩戴黑纱。4月16日8时,蒋介石的灵车驶向慈湖。慈湖行馆在台湾桃园大溪,蒋介石生前非常喜欢这里,并嘱咐其死后灵柩暂厝这里,"以待来日光复大陆,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"。

(摘自《今晚报》)

一九四七年,东北倡导"致富光荣"

1946年夏,东北解放区南部主要工业中心和棉花产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,对外贸易通道被切断,大量农产品积压,工农业产品"剪刀差"拉大,一时间陷入"胀死冻死"的困境:大豆在有些地区,每市斤两角钱到五角钱,比木材还贱,许多人用作烧柴。工业品极为缺少,每一尺普通布50元到100元左右,差不多是100斤到200斤大豆换一尺布。为了打破经济困境,当时东北解放区积极开展与苏联的贸易,以农产品换工业品,但是要完成农产品贸易任务,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,为此当时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下发了《关荣于开展农村生产运动的指示》,提出了提倡农村副业、组织生产互助、倡导"劳动光荣"的观念等八项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,开展了一场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。

由于1947年东北解放区是第一次搞生产运动,领导上缺乏组织东北生产的经验,群众在思想上还有顾虑,主要是"敢不敢发财"的问题。为此,东北行政委员会又连续下发多项指示,其中,5月6日颁布了《生产节约奖励暂行办法》,对农工业生产有贡献者给予荣誉和物质奖励,并指示各地"小奖劳模,大奖英雄"。春耕结束后,各地纷纷举行奖励劳模大会奖励春耕模范。

经过广泛发动,东北解放区大生产运动在全境展开,并取得了丰硕成果,不仅使东北解放区摆脱了经济困难,也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。有关数据显示,1946年至1949年,东北人民共交公粮686万余吨,并向国营贸易部出售粮食179.2万吨、棉花7488吨。1949年,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,东北又担负了入关作战的第四野战军军费折合粮食170万吨,并向关内提供了302万吨物资,其中上交中央80万吨粮食、150万立方米木材、20万吨钢铁。

(摘自《辽宁日报》)